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五輯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五輯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
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1377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五輯

第一冊 史學・先秦史研究論集

歷史學與人文學科

近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和文學趨勢

介紹戰後日本史學界對中國史時代區分的論戰

——以「古代」下限的爭論為中心（上）（下）

歷史地理學在日本

阿里・艾克伯爾之中國見聞錄與中國史料的比較批評

中國教育文化圈在東亞地區的形成

中國牛耕技術的起源

我國農田施用之堆廐肥

我國歷代農田之施肥法

我國內地棉花的推廣和栽培法

說沆

說茶

牡丹名稱起源考

Hajo Heiborn
黃復錄

羅炳輝

高明士

高明士

陳芳惠

林義民

高明士

何烈

陳良佐

陳良佐

陳良佐

于景讓

于景讓

洪安全

五四、四

五五、一

五二、二、三

五三、五

五五、四

五八、三

五五、四

五二、四

五六、五

五七、六

五二、一

五四、六

五四、六

五四、六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五輯 第一冊目錄

二

釋冬、變、杓、桐……

鄒景衡

五六、二

我國算算中之空位——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

陳良佐

五四、五

中國文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

朱雲影

五二、二

史前時代的人類……

宋文薰

五四、六

上古的食物……

連照美

五三、二

鹿皮與女媧的傳說……

莊萬壽

五九、二

中國飛地之研究……

許進雄

五四、一

盤項與乾荒、昌意、清陽、夷鼓、黃帝……

陸廷瑛

五一、五

陶弘景著「帝五年譜」以竹書為正……

王孝廉

五五、六

商代的社祭……

趙林

五七、六

由殷虛發掘所見的商代青銅工業……

萬家保

五八、五

殷武丁乙卯日食……

劉淵臨

五七、五

讀「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

周法高

五九、五

西周年代學上的幾個問題……

韓國方

五一、一

初周青銅器銘文中的文武王后……

韓國方

五三、五

陝西省岐山縣黃家村西周銅器的年代問題……

周法高

五八、三

城邦時代的貴族世官與采邑世祿……

杜正勝

五一、一

周代城邦之沒落及城邦之結束……

杜正勝

五二、三

周代城邦的社會基礎之四

四論周公受命攝政稱王問題

尚書中的周公

周代封建制度對於政治文化所生之影響

孔子「信而好古」說

申不害的「重術思想」研究

「開阡陌」辨

逆光考

黃彰健

杜正勝

楊亮功

陳槃

王曉波

侯家駒

蔡哲茂

五四、三

五六、三、四

五七、六

五八、四

五一、四

五九、二

五二、六

歷史學與人文學科

※

Hajo Holborn 著
黃俊傑譯

近代科學在摧毀西方文明中形上學的外貌並建立近代理性哲學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乃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在此一通程中近代史學思想的成長所扮演的同樣重要的角色却仍未受到充分注意。休姆（Hume）、伏爾泰（Voltaire）及其後繼者宣揚歷史就是神意的證據，這一種信仰使迷信的神話在史學上所做的正是科學家對自然所做的工作。當所有的神祕力量都被排除於宇宙的分析之外時，史學因此就被認為是人類行動與思想的知識。

自十八世紀以降，這種看法就構成了歷史研究的基本假設。而在其淵源上則與對進步的信仰以及對人的無限完美之樂觀的信念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甚至是在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期所出現的一般歷史哲學之中，舊式宗教解釋的目的論的性格仍保持不變，它在近代史學思想中也一直具有最深遠的影響。這種新式的耶穌派冷可從各種不同的方式上加以觀察。伏爾泰認為歷史就是一種朝向金鑰的啓蒙與幸福發展的進步。黑格爾則認為是透過對神的境界之認識的一種自由意識。甚至於雷孔德、斯賓塞或其他人以「實證」（意即科學）的歷史研究來取代玄想的歷史哲學之時，這種目的論的結構仍繼續存在著。

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所要反對的就是這種哲學思想與社會學思想。它肇始於德國，但在每一個國家中隨即出現了许多代表人物。它絕不僅以政治的研究劃地自限，它也觸及語言、文學、法律及經濟等等。時至今日已無人會懷疑，此一歷史研究較諸其他早期的學派獲致更大的及更可靠的成果。歷經百餘年來的努力，我們的史學知識現在已擴大及於人類文明廣袤的範疇（正如他們自己宣稱的一樣），除了極少數例外之外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對他們所傾心的哲學尚未有過深入的反省。除了極少數例外之外，我們發現他們仍處於不斷發展中的自然科學的影響之下。他們認為，歷史研究是從史籍之中重

建過去，史料如果經過嚴格組織，那麼史料本身就會和盤托出過去的主觀性。哲學必須被排除於史學範圍之外，因為哲學導入了一個與歷史的真相不相容的獨斷的模式。

雖然這種想法在史學圈內仍然廣泛流傳，但是它們常常只是史學工作者用來對他們的工作作一種勉強的合理解釋而已，這是以從十九世紀思想上的傾向，尤其是從近代經驗的史學研究與舊式玄想的史學兩者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加以解釋的。這種歷史哲學雖然對近代以來歷史的覺醒頗有貢獻，但是它同時也就是重建歷史世界一種重要的障礙。重視詳細的史實證據與排除目的論的歷史重建這兩者之間原有其邏輯上的必然性。但是這種狀況並不能就證明史學與哲學的分家是合理的。當一個注重經驗研究的史學家企圖提出一個關於整個歷史的看法的時候，史學與哲學分道揚鑣的危險性就充分地顯露出來了。在那種場合中，我們可以發現注重經驗研究的史學家大量地借用他們所不屑一顧的舊式的歷史哲學，或者甚至更糟的是，他們深受近代民族主義中自然論及唯物論的意識型態的支配。

如果歷史研究的方法與目的不能提高為更清晰的意識並出之以批評他態度來分析史實的話，那麼歷史研究將不可避免地失去方向上的意義，而且也不能說是一種客觀而有效的知識。哲學與史學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雖然似十八世紀的觀點看來它們之間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於我們所說的關係。哲學不能僅賴玄想而決定歷史的內容。哲學之依賴於歷史之哲學之依賴於科學。雷孔德撰寫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書的時候，他開釋了自然科學界所使用的「方法」。雷孔德首先提出歷史的理性的批判而受到下一代中許多學者的注意。關於歷史的理性的批判必須從史學方法的觀察開始，這種觀察的態度與康德是相近似的。

但是，把哲學與史學拉在一起的原因並不只是知識論上的關係而

己。哲學本身的一個基本問題：「人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迫使哲學家研究歷史。因為只有透過歷史才能瞭解人類主觀上的本性。人生並沒有新的起點。我們每一個行為與思想都基於包含於過去之思想並為的背景之中。而且，這種在個人上是如此的現象在文化或世界上也有同樣情形。在此「意識」之下，伽西德（Otagay Cassiti）最近說：「人類並沒有本性，只有歷史。」（註）

這種說法是基於一項認識：歷史上的時間與自然的時間全然不同。任何自然現象都是發生於某一時間之內。不論我們是否使用諸如「自然史」、「宇宙史」之類的名詞，顯然它明顯地構成某一時間內事件的一項結果（例如一顆原子彈爆炸連鎖反應），但是它本身並不是一件歷史事件。洛阿拉摩（Los Alamos）、廣島和長崎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是建立在近代科學心靈成長之上，因為近代科學誘導美國政府支持原子能的科技發展並在戰爭的最後階段裡使用它製成武器。我們在此無暇細論史學家所必須處理的關於原子能發生的每一個可能的細節。我們只要這樣說就夠了：它一切的細節都是必須透過人類的動機、行動及反應加以定義的題材。因此之故，它們都是單一的事件，它們本身是不會重演的，而原子彈炸的自然連鎖反應在相同的自然律之下相同的原素在相同的狀況之下是會再重演的。

所以，人類的歷史涵蓋著遠比時間的變遷更為豐富的内容。歷史的時間是一種有意義的時間，單一的「人類行為使它有了意義。人類身體本能上一再重複的食慾與慾望並不是歷史研究的題材，但是例如在人類文明中某種特殊的求愛方式的發展就是歷史研究合理的題材了。除了「持續性」此一原則之外，歷史也決定於「個體化」之原則，這種個體化的過程多少可藉黑格爾式的作為理性的實驗的方式來加以解釋。話雖如此，但是人類常常受困於其身體上的自然秉賦的限制，而且人類的意識也不僅藉理性的思想來表達，它們也藉意志及感覺來表達。史學家不要期望歷史會達到一個最終的目標，過此以往人性將僅由理性所推動，也不至期望歷史會變成永恆。

史學家作為一個史學家他甚至不能以有效地判斷力來預測下一個時代的大概情形，因為預測是與他的基本前提及研究發現相衝突的。

歷史既非一個新的開始，亦非一個最終的結束。歷史只能被當作是在歷史時間裡對於人類潛能的認識。但是，透過對於人類為控制自然所作的鬥爭的追跡以及過去意識的生活及思想的復活，歷史研究為生活中的這一代提供了一項挑戰：在把握過去人類經驗與成就的全部範疇的重要知識的基礎上來作一己重要的抉擇。因此，歷史使得每一個人把他的經驗擴大超越他實際的生活狀態成一個歷史性的社會之上，並吸收他自己來當參與的事件的成果。歷史研究開啓了參與全體的人類文明的大門。

這種參與必須詳加解釋。自然科學家觀察那種與觀察者不相干的實體的現象，但歷史則只有在史家的意識之中才是真實的。「歷史」這個字意指事實上發生過的史實，也指文獻記載的歷史——此一事實極具意義（雖然許多史家對這項事實感到惱怒）。只有當史家透過同情與瞭解去使過去復活的時候，過去才是存在的。史學方法論或史學的知識論的中心問題是建立在一項事實之上——關於過去的客觀知識只有透過學者主觀的經驗才能獲得。

歷史研究並不能使人免除其歷史性（Historicity），而且歷史人物所受的匪限也都受限於每個史學工作者。事實上，如果沒有主觀性，我們不能算真正深入於歷史之中。史家必須使其立足點深植於他自已時代的生活之中並勇猛精進地參與於其中。史家將不會因此而獲得歷史的答案，但他們將會形成用來研究過去歷史的問題。尤有進者，歷史只把答案給予那些知道如何問問題的人。而這說正是歷史研究的起點。歷史探討及理解的過程是一個從主觀的立場向普遍的立場移動，從歷史上浮動而偶發的運動（稱為「現在」）朝向作為歷史文明的一種經驗的人類經驗發展移動的一種持續性的奮鬥。

歷史解釋最重要的性質就是取決於人的觀念。歷史解釋不僅是對過去作判斷的一種結果，它同時也是研究者的一種自我分析。在這種重要的一過去一復活之狀況之下，生活中的這一代獲得了他自己更高的覺醒。因此之故，歷史研究是一種人文的工作。自西塞羅（Cicero）以降，所有的人文學者都希望知道人文的偉大及其廣度，他們也都深信這種知識將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認識他們自己時代最高理想的能

力。近代歷史研究就是建立在這個傳統之上，雖然它幾乎已改變了在此數百年前人文學所有的其他的觀念及方法。時至今日，歷史是獲致關於人類的知識的一種途徑，透過歷史，我們獲得了過去文明的遺產。對於人類潛能的重要覺醒使我們以更深入的洞見與更大的勇氣活躍於我們自己的時代裡。

※本文譯自 Hajo Holborn, "History and the Humanities," 原文刊

於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IX, No. 1, p.p. 63—69。譯原作者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普林斯頓二百年紀念會議：「百年前的人文學傳統」的會議席上所宣讀的論文。

(註) José Ortega y Gasset, *Toward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1941), 217, and *Concord and Liberty* (New York, 1946), 148.

近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和史學趨勢

羅炳錦

引言

歷史研究的目標、對象和方法，自晚清以來發生很大的變化，分類分工也越來越多樣化，單純的史料考訂，個別事件的建立，以及事實的敘述，新史學家都是不能滿足的。現代史學工作者，都希望能根據史料提供證據，對歷史發展演進提出新的解釋，新的看法。又想到瞭解一般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群體的狀況，歷史研究的範圍就越發擴大了。歷史學者同時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所以一般都只有在史料中選擇一極小的部分作深入的研究對象。因此，有「專題研究」，有「專史研究」。若干專題研究集合起來，便可成一個專史研究。專史研究，果能超分為五類：一、人的專史，如傳記和年譜。二、事的專史，如筆記東林復社、教案、專論戊戌變法。三、文物的專史，如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及社會史。四、地方的專史，如專記廣東的人物，或安南朝鮮和中國的關係。五、斷代的專史。這不過是約略的區分，是不必墨守成法的。譬如中國近代社會史，我以為應算是「斷代的文物專史」，就不能列入上述五類中的任何一項。總之，史學研究的趨勢，是越來越擴大，分工也越來越細的。

本文所說的史學趨勢，只指清末民初時代以來的史學，而且只以中國史研究為主，中西史的史學研究也不包括在內。這是因為本文目的係以「中國近代社會史」諸問題為主體的緣故。本文所指清代以前的史學趨勢約如以下所述（發展過程，不擬詳細論述）：第一階段，以考古考證為主，着重古代史及史料搜集整理。第二階段，以經濟唯物史觀為主，較重近代史，但陷於公史主義。第三階段為現代史學，注重事實與理論，範圍越擴大，多從經濟、社會與思想等方面以圖瞭解過去。多從事專題或專史的研究。到第三階段，中國社會史或中國近代社會史便應運而生而獨立自成一個系統了。

一 「史須為國民而作」

梁啟超曾指出古今史家的不同，說：「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實事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人聞一二有權力者與之陸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採舉人類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註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今日應做另行尋找新方法和新技術去寫歷史，是必然的。君主時代，史官的任務是為皇帝、皇室敘事，故「起居注」、「實錄」等史籍，以至紀傳體史書，都難免有它的局限性。以前是君主時代皇家社會，今日是民主自由世界工商業社會，再沒有一史官的存在，史籍卻仍是要編寫的，編寫的態度、方法和內容重點，當然也和以前不同了。康熙字典，在康熙時代可能是一部很新很適合社會人士需求的字典，但在今日康熙字典已是落伍的跟不上時代的字典，早就有重編的必要了。其他如上課教育方式，語文的習慣與運用，也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不斷在變化的。這種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是沒有人能更改的，它好像洪流，我們在這洪流中，有時是不能自主的。

歷史研究，以往很重視政治、軍事、帝王和士大夫處理重要人物的活動。但那只是以往的事。時代變，我們就必須創新。梁啟超說「不惜以今日的我與昨日的我挑戰」（同註一）。孔子是聖之時者，也不斷的要求變，使適合當代的需要。現代的一切，凡落伍的、不適合的，都得另求新面貌、新內容和新精神。前引梁啟超「中國史敘論」裏的一段文字，用意就是想說明這點。梁啟超說「近世史家，必採舉人類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這話是對的。推而廣之，現在的歷史，不再是記載皇帝、總統或將軍、或政壇要人的勾心鬥角的刊物，它應該更注意一般百姓的社會生活，實

若大眾的掙扎過程，它應該重視基本上屬於人民的文明，注視在底層的人民如何謀生？如何娛樂及教育自己。這就是說，社會史才是真正的歷史。今日編寫歷史，應該嘗試從底層往上寫起。這方法雖免遇上資料缺乏及其他種種困難而大受過，但它注意在底層的人民社會生活，顯然更能著重大多數。所以，這方法或許更困難，但對史家而言，顯然是一大挑戰（註二）。

依此而論，我們讀歷史、寫歷史，都要懂得正確的取捨態度，不能墨守成法。應該「取」些什麼，「捨」些什麼呢？梁啟超以下一段文字，也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

（春秋等書）所記僅各國宮廷事，敘官廷間相互之關係，而於社會情形一無所及。……天災地變等現象，本非歷史事項者，反一一注意詳記。吾儕因此可推見當時之史的觀念及史的範圍，非惟與今日不同，即與秦漢後亦大異。又可見當時之史，只能謂之簿錄，不能謂之著述（註三）。

梁啟超認為書中的天文志地形志等，不應屬於史書的範圍。我是同意的。梁氏的意見仍是要史家多注意「社會情形」。故此他寫一新史學「一文時，就強調「史須為國民而作」；梁啟超自己著述歷史時，確實很能踐履這一主張。他的史學著作有為民衆說話，常提及民權與自由；他打算編寫「中國通史」和「中國文化史」兩書（註四），雖都未能如願，他的中國文化史則已完稿（社會組織篇），全書八章，論階級、貴族、門第及奴隸諸問題，他是真能在編寫歷史時多注意「社會情形」的。

歷史潮流把君主為主士大夫形態的社會淘汰了，代之而興的是以民主自由為中心的新社會。研讀歷史的趨勢自然也得朝著這一方向發展。梁啟超能多注意社會情形，主張史須為國民而作，不過代表這一趨勢的必然性。所以，我們研讀歷史，何妨暫時把帝王、士大夫，總統或將軍放在一旁，而去探究社會大眾的種種問題呢？

二 中國社會史研究與「社會史」

觀念問題

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是由一些關心自己國家的知識分子瞭解中國社會的真相，社會的性質，社會經濟和貴族大業如何以一直臨於困境，而引起的。因為只有瞭解社會的這些真相，才能確定中國應走什麼路。但社會性質是什麼？社會病源在那裏，觀點與角度不同，看法便不一樣。因此發生「社會史論戰」。事情發生在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論戰的目的是：藉著此次論戰以便認識過去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來瞭解中國今日社會所以形成之故，從而確定將來社會發展應走的方向。但社會史論戰發生的時候，政治背景很複雜。共產黨企圖以他們的「學說」使人相信其理論的正確，左派人士（又叫新思潮派）郭沫若、沈澤民、王學文、何幹之等，便積極的在「論戰」中宣揚他們的一套理論。右派人士（又叫新生命派）則有王雲五、胡秋原、吳稚雲等。當然也有不屬黨派，只站在學術討論立場去參加論戰的，他們是陶希聖、李季等（註五）。當時的論戰雖然熱鬧，可惜抱政治目的屬於「革命的宣傳家」的，以及觀點與理論幼稚，硬把唯物論社會發展的公式搬到中國歷史的範圍的，未免太多。雖然如此，筆者覺得此次論戰不是完全沒有收穫，它的收穫就是：從社會性質的爭論，發展到有宣揚革命動機政治野心，再轉而成為純學術的探究。社會史論戰的發展，約如下表：

學術性質 → 革命性質 → 純學術的探討
革命前途

所謂純學術的探討，主要是指陶希聖主編的「食貨半月刊」的出版，食貨半月刊創刊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陶希聖基本上相信：「史家不能創造歷史。反之，歷史的研究產生史學。」要斷定中國的發達過程，當從中國社會歷史的及現存的各種材料下手。如果把史料拋開，即使把歐洲人的史學爭一個落花流水，於中國史毫無用處。於今的學者不獨把歐洲的史學當做中國史的自身，並且把中國古代學者的史學當做古代史的自身。笑話太顯得悲慘了。我們因此……寧可用十倍的努力在中國史料裡去找出一點一滴的木材，不願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譯歐洲史學的半句字樣，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樓閣」（註六）。就

憑着陶希聖這一「從史料下手研究」的信念，他主編的「食貨半月刊」就真的站在此學術討論的立場去繼續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的討論。陶希聖先生此舉，顯然是有意補偏救弊的，也只有如此，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才能逐步走上正確的道路，並有一定的成果。

與社會史有關的著作，於是都慢慢出現了。陶希聖主編的唐代寺院經濟、唐代之交通、唐代土地問題（均列為中國經濟史料叢編），陶希聖編清遠合著的唐代經濟史，以及屬於中國社會史叢書的元經濟史，朱其華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綱要，此外又有王治瑞的宋貨幣、中國社會經濟及其結構，其他如胡秋原、李季、郭沫若、周谷城……都有屬於社會史範圍的著作面世。這些論著，有在食貨半月刊創刊之前的，但以創刊之後的居多。

在衆多的社會史論著中有一個特色，就是都偏重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好像社會史就是社會經濟史似的。當然這由於社會史論戰發生前後，中國社會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所以論著也以此為主。

社會史的著作，和「社會史」觀念的產生，當然是有關係的。我們中國一向就是先有事實然後有該事實的定義或觀念。譬如歷史，就有很多史籍產生，然後才有「史學」觀念。「太史公書」一百三十篇，最初列在漢書藝文志七略中的六藝略裏面，後來史書日多，才另有一「史部」的成立。史部又再分正史、編年、政書、紀事本末等等。以梁啟超的「社會史觀念」來說，他是把「社會史」納入文化史範圍內的。他原想編寫中國文化史，其後却只寫成「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一小書（社七）；梁啟超想編寫的「中國通史」，項目中也有很多屬於社會史範圍的，如宗教、階級、鄉村社會、禮俗、城郭宮室、田制、農事、物產、風俗（森林山澤之類）、工業、商業、貨幣等是。再如劉師培的中國歷史叢書，也深以「中國史之敘事，詳於君臣而略於人民，詳於事跡而略於典制」為不啻，因此他的「中國歷史叢書」很重視社會史方面的介紹，例如：第一冊第十四課：古代階級制度，第十五課以下論封建、倫理、宗教、文字、學術、風俗、禮

制、官制、田制、兵制、刑法、學校、商業、工藝、宮室、衣服。又第二冊論周代歷史理制名物等情況頗詳如，如第八課以下，包括西周階級制度、地方自治、宗法制、宗教、學術、財政、商業等等（註八）。○應注意的是：梁啟超、劉師培二人雖很注意社會史方面的介紹，重視人民生活、階級、衣服、商業等的史事。但梁劉仍未刻意把「社會史」獨立另成一專史的研究所集結，只是把「社會」附在文化史及通史之內。真正把社會史提出來作專史研究，並實際在這方面做過不少工夫的是陶希聖先生。從梁劉陶等的史學著作來看，社會史必於社會從中國歷史範圍裏脫穎而出而獨立自成一套統的這種史學發展趨勢是很顯然的。

而且，從梁劉陶等與社會史有關的著作裏，也已可以看到「社會史」的內容包括些什麼。「史」的定義，本文不擬討論；却想討論一下「社會」的意義。形成社會的要素很多，絕不只是經濟一項，故此「社會經濟史」只不過是「社會史」中的一環，兩者絕不相等。Sociology「社會學」一詞，是後起的名詞，略遲二十世紀以後才有。一九〇三年羅賓斯（H. Spencer）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 譯名是「群學群言」。其後才有以「社會學」代替「群學」的，那就是吳達常譯李卓史 Giddings 的著作為「社會學大綱」，為社會學輸入中國之始（註九）。「社會」一詞的定義，也是眾說紛紛的。政治和經濟都是組成社會的重要因素，但組成「社會」(Society) 更重要的因素却是「人類之間的複雜關係」。故此給「社會」下一定義，應該以人類為主體；那麼「社會」就是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人類之間的關係的總和。人類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人類因家庭生活和生理和血統的原因等，結合而成一定的家族關係（家族關係擴大、發展，就有鄉村社會、都市社會）；人類在社會發展的各個特定階段，由於人類之間存在着如何共同生活維持一定秩序以免爭執出亂子，於是人類及鄉村社會組織、城市社會組織等的產生）；此外更重要的是人類在經濟生活中有一定的利益和生產關係諸問題的存在，這樣人類與人之間也不能不注意到經濟關係（於是有貨幣制度、工商業社會等問題的

產生)。

所以，「社會史」基本上就以前述人與人之間的「家族」(擴大發展而成鄉村、都市社會)、「政治」(指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係)「經濟」三種關係為其主要內容的。

但這樣的「社會史」的觀念，是回顧以前述方面的刊物論著加以綜合分析然後推展的。以前一般學者比較注意的只是社會經濟史。譬如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在民國二十一年出版「中國近代史研究集刊」，到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出版第五卷第一期，改名「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當然，關於中國經濟史的著作也很多，如錢亦石的「近代中國經濟史」(民國二十八年生活書店出版)。此外，因關心社會問題而研究社會史的論著，也屢屢在刊物中出現。民國十九年三月由北平社會調查所發行創刊「社會科學雜誌」，談合作事業、人口問題等之外，探討歷史上的「牙行」、晚清財政、及貧富社會等經濟史問題的論著，也多得很。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編印的「社會科學論叢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有陳嘯江撰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總成績及其解決問題」一文，陳嘯江本人主編的「現代史學雜誌」(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也出版過一期「中國經濟史研究專號」；同時(民國二十二年)不久，「中國經濟雜誌」第二卷第九、十兩期也出版「中國經濟史研究專號」兩冊，不難陳嘯江專美於前。

有了這些社會經濟史研究如史如案的背景，再過一年——即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陶希聖先生的「食貨半月刊」就創刊了。食貨半月刊標明為「中國社會史專攻刊物」，而其中所列登的文字，十九屬於經濟史範圍(註一〇)。史學界有此一流派與趨勢，再發展再擴大，便從中國社會經濟史一變而成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再變而另成「近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潮流，就成為順理成章了。

從抗戰前十年的社會史論戰，到「社會科學雜誌」、「社會經濟史集刊」、「社會科學論叢」，以及「食貨半月刊」的出版的過程來看，討論的問題已不限於社會史與經濟史等經濟問題，而是進一步討論到家族、人口、教育、風俗及鄉村與城市社會諸問題(從陳嘯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總成績」一文所記的研討成果可見)。詳

復。○另一方面，當時大家最關心的是社會建設問題，社會建設當然不限於經濟物質方面，故此有「北平社會調查所」發行的「社會科學雜誌」；此外還有舊傳統的家族社會其相如何、怎樣予以改革來適應新時代，也是社會群眾知識分子最關切的問題。同時，共產黨提倡了要人相信經濟唯物觀，國民政府則盡力從事各方面的社會建設以對付共產黨——這樣的背景更助長歷史研究趨向於瞭解傳統社會結構及經濟發展的熱潮。

在這樣的背景和歷史研究潮流之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是必然擴大的；於是經濟擴展到家族和政治的範圍。如本文所指的「社會史」觀念，已在逐步形成中。

三、近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園地的開拓及其基礎

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是隨著史學發展的潮流而來的，我們回顧社會史論戰前後時代，和有關社會史論著的刊物，則社會史研究的園地本來是多要多彩、很熱鬧的。○跑到這園地來播撒種子、灌溉和耕耘的大不乏人。○就可惜灌溉耕耘的有些都別有用心，使園地泥土裏滲入為革命宣傳的野心家的毒藥，使這園地變成不學術的。○為學術研究而研究的人只好忍痛離去，想參與耕耘的也不敢參與(這是後來使人覺得社會史研究的園地頗為冷清的原因)。○但事實上如果我們看民國二十六年陳嘯江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總成績及其解決問題」，歸納起來最少說明了以下三點事實：①中國社會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很有基礎，很有基礎。②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的資料(不是著作)也很多，無形中有助於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③除少數人如陶希聖等人之外，大多數參與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仍難免泥足深陷，陷入空論「社會性質」的深溝而不能自拔，仍深信「原始共產社會」、「亞細亞社會」、「封建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及「現階段社會性質」等的問題是必須「待決」的。

現在試把陳寅江一文作一粗略的統計：第一部分，是「讀書雜誌」（王禮揚主編）所主持的四次社會史論戰的文章，除通信教通等不計外，計有論文五十篇，內容分配如下：關於過去社會的二十五篇，關於現社會的十八篇，泛論的六篇。第二部分，最重要，是陳氏搜集到的關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書目，①總共有一九一種，學報及雜誌所載有關論文未包括在內。②一九一種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書籍，中文的最多，也有英文的、俄文的、日文的及法文的，以及翻譯的。包括以下四類：一、通論全史的共十二種，如加藤繁的支那經濟史。這部分的書，陳氏說：「較可人意的中國經濟史（全史）」，至今尚沒有。③大部分都是平厲、淺薄。二、斷代史，又分古代、中古及近代、近代及現代。共七十四種。三、部門專史，共八十四種。裏面又分農業史、土地史、民食及人口史、農民鬥爭史、工業史及工藝史、交通史、商業史及國外貿易史、行會史、貨幣及金融史、財政史、區域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共十二個小項目）。四、泛論的體裁，共二十一種，如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的分析等書。④此外更有專門刊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論文的「學報」及「雜誌」，共計中文的二十五種，日文的十六種，英文的七種。總共四十八種。學報如清華大學的社會科學學報，北京大學、武昌武漢大學、及中山大學各別出版的社會科學季刊，北平社會調查所的「社會科學雜誌」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中國近代經濟史集刊」等，雜誌則有食貨半月刊，及中國經濟（南京中國經濟文化社）等（註一）。

可見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園地，早就開拓了。有這樣可觀的數量的研究結果，加上社會改革的要求，社會問題的壓力，很容易把一般性的政局部片面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轉移到「近代」部分。陳寅江談到近代及現代部分的著作時，列舉出來的就都很多（共四十二種），佔總數的「一九一種」的百分之二十二，例如：侯學坤的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施復亮的中國現代經濟史、賈士毅的民國財政史、羅玉東的中國鑛產史等等。只有朱其華的中國近代社會史則並不是只論經濟，而顧及到政治和勞工運動問題。近代部分屬於資料性質的書

刊，更值得注意——如田中忠夫的中國農村經濟資料（江陵泉源）、馮和法的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以及實業部編的中國經濟年鑑，財政部編的財政年鑑，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的「中華民國統計提要」等，多為民國二十至二十四年間編纂的（註一二）。○時到今日，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更有不少非凡的論著產生了。如張仲禮借用社會學的方法，對清季的士紳階層精確的加以分析；何炳棣利用家譜及地方誌的資料，對明清社會垂直流動的研究，以及他對近代中國人口的研究；郝運平關於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的研究等等，都很值得注意（註一三）。○可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加上資料性的刊物，很足夠供應我們去發掘問題、整理編寫符合現代需要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的論著了。

為什麼陳寅江「總成績」一文，列舉的成果這樣可觀呢？這有兩個因素：第一、近代新史學觀念的演進，使史學趨勢傾向注重社會群眾及一般民生問題。第二、空想主義及當代主義的影響，和中國人在近代史裏的切身遭遇，史家開始感覺：時代越近越重要，而豐富的近代史資料，又多數與社會及經濟有關係的。這兩點因素，剛好成為近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基礎。

以下就此兩點予以說明。

中國近代社會各方面一直都受西方的影響，在史學方法觀念上也如此。進化論影響清末民初的公平學派例如梁啟超等人，覺得社會也是不斷進化的、進步的。今不如古的觀念，厚古薄今的看法就改變了。近代史就越被重視。在政治思潮上，君主已不合潮流，而須要民主。既要民主，就要多注意羣衆的社會發展情況。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經濟成就如此輝煌，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經濟即使敢者痛心。何況？中西社會比較如何？於是想到研究近代史，也應注意近代社會史，將史學解決疑難問題。換言之，歷史潮流，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基礎之一因素。

其次，近代史資料的發現，整理出來的資料之豐富，又多與社會經濟有關。這的不必說，近的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來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包括海防檔（購買船廠、福州船廠、機器

局、電線、鐵路)、中俄關係史料(包括外蒙古、中東鐵路、東北及新疆邊防等)、礦務檔案、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清季稅務檔案等,共十七種。又有故宮博物院文獻委員會整理的「宮中檔康熙朝奏摺」(共六輯)、「宮中檔光緒朝奏摺」(共二十六輯)、道咸同光四朝奏摺(共十二冊,商務,故宮博物院清代史料叢書)等,均近年出版,都很可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對近代史的研究,我想將來仍是會走向「社會經濟」或「社會史」的研究方面的。因為這是史學趨勢使然。○中研院近史所在「專題研究」方面約略分為四部分:一是國際關係,包括外交、國際法問題。二是內政,包括政治、軍事、財政、教育及各種制度。三是文化思想。著眼點在中國全面性思潮的衝擊後所產生的反應。四是社會經濟(註一三)。○中研院近史所所長王雲五說:「最初,我們同仁多偏向國際關係及政治方面的研究,到最近幾年,才有部分同仁作文化史、經濟社會史的研究,我們希望慢慢推廣下去」(同註一三)。事實上,近史所在過去三年進行一個「近代中國區域近代化」的研究,時間是從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到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列為第二期研究範圍),選擇沿江沿海最重要的十個地區(閩、浙、台一區,江蘇廣東湖南湖北上海東三省、河北、山東、四川各一區),分別由十位專任研究員或副研究員每人擔任一區,從政治、經濟、社會等的近代化來著手研究。事實上,中國近代化分區的研究,不能不牽涉到社會各方面(例如法律、警察、農村的近代化,不能不提及,而這些就是近代社會史中的一些重要課題)。○專題研究也已到了社會經濟的範圍。而且,近史所的珍貴資料中還有數量相當多的經濟檔案,包括經濟部在民國五十五年送銷的舊檔四百五十箱。所謂經濟檔案,不只是經濟部本身的檔案,並有農林部、水利部、實業部(包括偽實業部)及其他和經濟部有密切關係的機構裏面的資料。一如中國經濟委員會、水利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等的檔案。時間大約從光緒廿七年辛丑到民國卅八年,長達半世紀之久。這實在是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很珍貴的資料。所以,近史所的研究逐漸走向近代經濟社會史,然後再擴大為近代社會史,也是順理成章。

章的事。因為集合若干「專題研究」,就成為「專門史」的研究。

而且,近代的史學,都深受實用主義與當代主義的影響。大部分的史學都不再滿足於單純的史料考訂,個別事件的建立,以及事實的敘述。從此史家都開始探索政治史,而從經濟、思想和社會來試圖瞭解過去。既然如此,則在衆多的近代史資料中,多找與普羅大眾社會團體有關的去研究,是很自然的事。○思想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專門史都早已逐漸確立,社會史就不會例外。其次,在過去的歷史和近代歷史兩者,一般都比較重視前者。不論從思想、政治制度等方面來說,明代以前的思想或政治制度等等,前人都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反之,清代以後,政制學術經濟社會各方面有待整理的資料很多。○「略古詳今」是歷史上的原則,梁啟超說:

史事總是時代越近越重要。考證古史,雖不失為學問之一體。但以史學自任的人,對於和自己時代最接近的事,資料較多,詢訪質正亦較便,不以其時微成幾部宏博翔實的書以貽後人,致使後人對於這個時代的史跡永遠在迷離徬徨中,又不知要費多少無謂之考證才能得其真相。那麼,真算史家對不起人了(註一四)!

從近代史、專門史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近代社會史受到重視是必然的。

據上述可見:新史學觀念、社會改革、社會問題的壓力等形成的歷史潮流,使史學趨勢傾向注重社會改革,是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第一個基礎。○近代史資料豐富,而又多與社會經濟有關,時代越近越重要,近代史受重視,專門史逐漸確立,受西方實用主義、當代主義的影響,而更重視用經濟和社會觀點去瞭解歷史,這是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的第二個基礎。

四 範圍及研究的途徑諸問題(註一五)

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範圍,從內容類別來說,應包括:甲、社會組織,內含社會結構在鴉片戰爭前後時期的變化,鄉村社會、都市社會,和社會流動。乙、社會制度與風尚,內含清代以來的禮法制度

(審判獄訟的標準、刑法的改革)，學館和士子考試情況及旅費等的籌措(文考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家庭婚姻制度、會館制度、和喪葬祭祀、蠶足、鄉塾等風俗。丙、社會經濟、內含清代以來經濟政策的轉變、工商行會制度及其發展、貨幣制度、土地制度、鑄金制度、內債與外債、勞工制度與勞工組織、以及典當業的發展等等(這部分可以用「經濟制度」的名義附於乙部，但因社會經濟資料較多，亦較重要，故另列為一部分)。

從歷史時期的劃分來說，中國近代社會史和中國近代史應有分別。因為中國的國際地位、政治和外交的演變，鴉片戰爭是比較清楚的分界線。但中國的社會制度如婚姻、家庭、禮法、經濟以至社會經濟制度等，並無清楚的分界線；再以社會組織、社會結構、以及城市鄉村的演變來說，也並無清楚的分界線。尤其當錢謙到家庭制度、刑法制度和城鄉的演變史時，往往得追溯到唐宋以前。因此中國近代社會史的起迄，較諸中國近代史更難以確定。茲姑以一五八二年(明萬曆十年)利瑪竇來華之年為起點，至一九三七年對日本抗戰之年為止，作為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範圍。因為由明萬曆至清乾隆二百年間，是舊耶穌會士在中國活動的時期，他們對中西文化交流很有貢獻，撰譯無慮數百種，耶穌會士事跡可考者近五百人，較早較重要的則以利瑪竇為首。此其一。中國社會男女授受不親，婦女裹足而不輕於露面等風尚，那時仍多如此；滿州人入關後，婦女天足者漸多，士大夫較開通的反對裹足者不乏其人；鐘表、地圖、槍械等武器又逐漸大量傳入，帝王士大夫和百姓接受天主教的也漸多。換言之，中國社會有較明顯的變化，似以萬曆以後為顯著。此其二。當時中國的物質文明很多方面仍可媲美歐西諸國，此後不久，西方工業革命成功，中國的物質文明便望塵莫及。這是我以一五八二年利瑪竇來華為中國近代社會史的起點第三個原因。

至於研究的途徑、觀點和方法是必當注意的。以往以唯物史觀等理論硬套進中國歷史裏，等於先有理論然後再選歷史事實，是不對的。我們研究的既是中國近代社會史，就要用「歷史的觀點」、「社會的觀點」和「生活的觀點」去研究。歷史的觀點就是必須先注意歷史

事實的發展，分析問題以歷史事實為基礎。因為中國社會不是靜的，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動的，是幾千年歷史運動所形成的。一千年前自然經濟優越於貨幣經濟。一千年來，貨幣經濟漸漸優越，商業金融資本主義逐漸形成。近代史裏所見的金銀資本商人資本支配下的小規模生產制度，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這様看便不會把什麼封建社會之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演變公式搬進中國的歷史裏。

再說社會的觀點：中國社會構建及政治組織，係舊史家看來，是個個人物造成的。但大人物之所以大，是因為他擔負所代表的社會勢力之大。孔子支配着二千年來的社會意識，這是不錯的。但孔子所以有支配力，是因為某種社會勢力的擁戴及援引。所以觀察社會，不擇個人的觀點，而取社會的觀點。

至於生活的觀點(或稱爲心物合一的觀點)是：中國歷史是地理人種及生產技術與自然科學所造成，也是觀念的發展和思想的結晶。中國歷史所以沒有像歐洲近百年來急劇的變遷，所以不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所以有週期病的現象，這些不僅是某個人某學說某政治主張所促成，並且是社會經濟人民生活的反映(註一六)。

用以上的三個觀點去研究，則既不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也不站在工農商或士人的立場，而係以客觀的學術研究態度去探索社會史。這樣，應該是比較可取的。

中國近代社會史的資料，應該注意以下三類：①地方志，如省志縣志以及寺廟園林學校書院等志。②傳記年譜與回憶錄，選擇其中的作者曾落實到現實社會，與現實社會有密切關係的。譬如有關晚清州縣官和幕客(鈔卷)的社會生活及際應酬與百姓的關係等情況，程滄漁的「樸菴老老」，龔德柏的「縣志」兩篇文字，便都值得參考。又如食貨月刊社最近出版的「徐悲翁自敘年譜」，反映增主徐增在晚清六七十年的工商業生涯，有助瞭解當時的上海經濟社會，可當作「晚清上海經濟社會史」看。③近代研究的成果及資料性質的刊物：如陶希聖的「清代州縣衙門刑事審判制度及程序」，並前引陳嘯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總成績及其待決問題」所列書目的有關部分，以及中國經濟年鑑、財政年鑑、上海年鑑、廣西年鑑、十年來之

中國經濟建設(學海出版社影印「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刊本」,以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來至民國廿五年六月底的十年為內容)等等。

對於近代社會史資料的處理方法,也不可忽略。基本上是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去處理;當然也得略知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現代的歷史學者不能只靠一般常識來判斷歷史問題了。現代社會科學家的若干發現,使常識的層次提高,如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考古人類學等等,都是史學研究者,特別是近代社會史研究者應當擁有的輔助知識。但是,只限於輔助知識而已;因為我們無法也不必將各種社會科學都做到精通的地步。

中國近代社會史,是一個已開拓了的園地。照史學趨勢看,它將越來越熱鬧;目前却頗為冷寂,希望能有更多史學研究者到這園地去參與拓墾的工作。

五 小 結

史學趨勢與時代背景是必然配合的,二者關係密切的。因為史學不能脫離時代現實環境。近代歷史的時代背景是着重經濟、實用和科學——因為這有助於社會民生的改善。近代歷史的時代背景,同時也着重於家族社會、家庭制度的適應新時代的問題;着重於社會羣體的秩序與制度,要求自由與平等。而君主、軍事與政治,與民生實際的切身問題,已不如法律制度、勞工規律、以及新的極權制度關係之密切。

這樣的近代史時代背景,促使研究與關注經濟社會史的熱潮,遠勝於政治軍事史等研究的史學趨勢。所以近代史學發展趨勢,大致是這樣的:第一階段,側重考古、考證,和古代史的研究,重視史料搜集與整理(約晚清至民國十年)。到了第二階段,已有些人能夠用科學方法治史,把社會進化觀運用到史學上,但這階段在經濟史、社會史的研究影響較大的却是唯物史觀派,以唯物史觀或經濟學為史學,陷於公式主義為其最大缺點。此時已比較注重近代現代史的研究(第二階段約由民國八年到二十年)。

史學發展到第三階段,很多歷史學者已描摹詳於君而略於民的治史,並反其道而行之,要詳於羣眾社會下層謀生擇北等史實,與梁啟超「史須為國民而作」之說相符合,史學力求適應時代的需要。這時期在各類專史研究中,更着重近代現代經濟史,和近代現代社會史的研究(第三階段約自民國十六年到廿六年)。

到現階段,就是從一九三七年迄今。中國社會仍有持續不斷的改造,對近代社會的瞭解是繼續改革與建設所必須的。所以,對近代社會史的探討研究,就是理所當然了。

附啟:本文係承師大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之邀,于五月下旬為該所所研究生演講而作。一九七七年夏日,時客次中研院近史所。羅炳煥。

註 釋

(註一)見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之六,頁一。台灣中華書局重刊。(下同)。(註二)歷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專集之九十九,頁二十三。又參拙作「梁啟超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創新」(新亞學報,第十卷第一期「上」,一九七一年九月出版)。

(註三)民國六十二年,美國史學家富蘭克林曾演講過「美國歷史研究與寫作的趨勢」,強調研究「人民的文明」和「社會史」的重要。可參閱台灣「新知識」(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所載蘇雲華譯「美國史學家富蘭克林教授講「最近美國歷史研究與寫作的趨勢」一文」。

(註四)中國歷史研究法,頁十一。參註一。

(註五)梁啟超打算編寫的中國通史和中國文化史,而兩書已編好綱目,見飲冰室專集之四九,頁十五、十九。

(註六)詳參鄭學稼「社會史論戰的起因和內容」,台灣中華雜誌叢書,民國五十四年出版。又參何特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上海生活書店,一九三七年出版。

(註七)陶希聖「中國社會史叢書刊行緣起」,民國廿三年。見金漢昇撰「中國社會史叢書刊行緣起」,上海新生命書局刊行。